

# “时代”定位的思想支点

## ——兼论历史叙事与趋势判断

王三义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以文化特征或经济特征定位“时代”,取其标志性或根本性,以世界格局变动为标尺定位“时代”,则取其整体性。从学理上推究,定位“时代”的信心来自于19世纪至20世纪历史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成熟,其思想支点是社会进化和历史进步的观念。因为在此前提下才达到宏观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高度和深度,而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的世界变化在提供着事实依据和实景支撑。近代以来欧美国家形成西方优势论、殖民论和帝国主义论等价值判断,产生了一整套历史叙事。东方国家如中国和土耳其等形成了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自强独立等价值判断,产生了另一套近代历史叙事。两种近代历史叙事都延伸到现当代并得到强化,“变局”的判断仍是在东方和西方谁进谁退的语境里。

[关键词]“时代”定位;时代特征;思想支点;历史叙事;趋势判断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6.019

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知识和信息容易获得,专门术语往往并非为某一类学科、某一些领域所专有;相反,在人们讨论现实问题时信手拈来。例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政策文本到寻常百姓谈论国内外局势,都已成为娴熟的话语。学界也有不少解读和阐释,<sup>[1]</sup>不仅洋洋洒洒,随题立论,而且追本溯源,联想到清末“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判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评,以及普通民众借助网络对世界局势变动的评头论足,既反映出开放程度和文明高度,也能看出形成于19世纪的价值观念和相应的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事

实上,不同学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确认“时代”并运用判断力,试图自圆其说地阐明人类历史演进的规律。由于历史学的包罗万象,各个学科的成就和贡献都会放在历史学橱窗里展示出来。工业革命以来的近代历史占据的位置过于显眼,无论以哪个特征衡量,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为此,有必要解释近代历史叙事的延伸和背后的观念,并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来深入探讨。

### 一、“时代”与时代特征

每个人生活于具体“时代”,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征。这虽是常识性的判断,却不是

近代社会之前就存在的常识。历史学为了史书编纂和学术研究的需要而划分时段,古代、近代、现代的划分标准和由此产生的歧义构成了“历史分期问题”。哲学和社会科学不纠缠“分期”之精确与否,更强调“时代特征”本身并坦然应用。细究起来,无论在哪个语系中,“时代”<sup>[2]</sup>一词均泛指或特指一个历史阶段。最具概括性的时代称谓是“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相应地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术语。而整个文明时代又简单地分为“农业(耕)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包括当下的“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在世界文明史中有“古典时代”“黑暗时代”“航海时代”“启蒙时代”“全球化时代”等等划分。其中“农业(耕)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以经济特征(具体生产门类)为标志,“黑暗时代”“启蒙时代”则以文化特征来区分。这些划分都有一定的观念基础。例如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认为,“一个在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观念并不是产生于某个时代之内,而是它本身就创造了那个时代……这个观念整体属于我们的时代,它影响着所有的思想家。”<sup>[3]</sup>当然,我们不需要追问斯宾格勒哲学思考的起点,仅仅借着这个说法,来审视我们熟知的“时代”定位和相应的价值判断。可以确定的是,用以定位“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经济特征,两者存在明显差异,各有其理由和价值取向。

### (一)以文化特征为依据

“文化既是是个别的,断代当然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sup>[4]</sup>要判断古史和古文明,可依据的只有青铜器、文字、城市遗迹、宗教建筑等,而整个人类文明时代也呈现不同阶段的文化特征。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把历史划分为“神祇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三个时代的更迭与社会变革相联系。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则认为人类历史从15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才开始,此前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千年空白”。孔多塞(Jean Condorcet,1743—1794)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为十个阶段(也

是十个时代),从原始时代、畜牧时代、耕稼时代开始,经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黑暗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等,最后阶段是尚未到来的幸福时代(特征是机会平等、自由、理性、民主、教育普及)。<sup>[5]</sup>孔多塞试图把文明进步的必要性建立在人类精神不可改变的特征上,又有所超越,着眼于人类所经历的各文化阶段。<sup>[6]</sup>赫尔德(Herder,1744—1803)把人类历史分为“诗歌时代”(人类童年时期)、“散文时代”(人类的壮年时期)、“哲学时代”(人类的最成熟时期)。<sup>[7]</sup>但他的历史观念还不是新观念。把人类历史划分为“青年时代”“老年时代”的还有帕斯卡、博绪埃和让·博丹等,<sup>[8]</sup>他们认为现代人站在古人的成就之上。斯宾格勒把人类历史按照文化划分为两个时代,一是原始文化的时代,一是高级文化的时代。何谓“高级文化”,斯宾格勒以洋洋数十万言来论述,超出普通人的理解,两个时代的划分也未被普遍采用。

欧洲史的“上古”“中世纪”“现代”划分方式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后来形成了今天熟知的欧洲历史上的三个时代: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为“古典时代”(Classical Ages),也是“理想时代”或“黄金时代”;“中世纪时代”(Medieval Ages)是“黑暗时代”;复兴古典开创新局面的时代即“现代”(Modern/Modern Ages)。“现代”又依据文化特征划分为“文艺复兴时代”、“博学时代”(指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早期,以古籍整理和研究为主要特点)、“启蒙运动时代”(一般称启蒙运动时期)等。至于古希腊之前的历史,尤其是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历史,一般放不进这个时代框架中,另外称为“古代的东方”历史。<sup>[9]</sup>

在世界范围其实只有中国和欧洲(从古希腊到当代西欧)形成贯古通今的独立史学体系。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统一时期以“朝代”区分,一个朝代是一个时代,而动乱和分裂时期以其外在特征划分,如“战国时代”“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等。政治清明的时期以帝王年号标识,如“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早在

《春秋》中就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的划分。汉代何休注《公羊传》时概括出相应的社会治乱特征,于是形成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划分(清末的廖平、康有为仍使用)。在西亚北非,从阿拉伯国家直至奥斯曼帝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的王朝体系没有继承关系,因而其历史没有连续性。伊斯兰国家对“时代”的认识囿于宗教观念,由重要宗教事件和相应的年份来确定。至于这些国家重新思考历史并重新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已是20世纪建立民族国家,接受西方社会科学之后的事。

近代以来世界面貌改变,历史观念也随之重塑。以重大历史事件来划分时代,既超越王朝体系,也跨越国界。例如,19世纪以来的史家把西罗马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陷落、尼德兰革命等重大事件作为历史起讫的分水岭,怀疑古代史家的神话史观、英雄史观,也提出新史观。他们质疑年代循环的历史书写或以创世纪、耶稣诞生为参照系编年纪事的可信度,<sup>[10]</sup>却在继续沿用基督教普世史观念下的编年体。又如,作为历史课题来研究文艺复兴,会把“文艺复兴时代”看成一个从13世纪持续到16世纪的过程,所关注的文化特征包括:大学的兴起、罗马法的复兴、教会法编订、古物整理修复、哥特式建筑流行、商业意识增强、通俗文字普及、市民文学产生等等。

历史学是追溯因果并探究进程的学问,历史分期和“时代”定位主要考虑方便可行。哲学家把关于时代的思考提升到哲学层面,既有深度也有高度,但不易为社会科学所熟知和使用,也不容易变成通俗用法。例如,法国的杜尔阁、德国的阿佩尔特、赫林、弗莱埃等人在著作中对人类历史各阶段的划分有不同的见解,<sup>[11]</sup>但专业性过强,不被通俗历史编纂者采用。斯宾格勒批评史学家把历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现代史,以这样空洞而无意义的分期法主宰了我们的历史思维,有碍于我们认识“高级人类在通史中的真正位置”,也无法判断局部(如西欧)的相对重要性,尤其无法估计其发展方向。<sup>[12]</sup>影响面较广的

是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Axial Age)概念。<sup>[13]</sup>他把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印度和中国放在同一个视角下考察,指出这三个文明的相似性和差异。一般认为他突破了黑格尔的基督教纪元,使历时性的普遍历史面向多元文明的“共时”特征。<sup>[14]</sup>不管怎样,在后来的文化书籍和社会科学著作中,通行的“时代”定位还是以历史学的文化特征为主要依据。

## (二)以经济特征为依据

客观地说,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划分是重要的。毕竟当代人只能按照时间距离的远近来处理历史,确认自己的位置。历史学借助考古学提供的信息,把古代历史向前延伸,了解到进入阶级社会和出现国家之前农耕生活已经出现。在八千年前,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Çatal Hüyük)和巴勒斯坦的杰里科(Jericho)就已经成为黑海和红海之间的贸易中心。这两个地方也提供了“人口骤然增加”的早期例证,学界常把这些发现表述为“农业革命”。<sup>[15]</sup>

农业(耕)文明时代漫长,这个时代的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和商业为辅。一般认为,贸易比国家还古老,贸易活动至少早于农业和其他正常的生产活动。工具和武器生产、城市、私有财产、公共权力,以及定居、村庄、人口增长、产品交换等的存在,都是农业(耕)文明时代的社会特征。国家的基本需求除了安全和独立,就是保护工商业,发展经济,让国家富强。马克思主义学派对物质基础的重要性进行了充分讨论。西方学者所说的“不能再缩减”的国家利益中,“物质生存”和“经济繁荣”是基本要素。物质条件和经济因素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标识。

在农业(耕)文明时代后期出现工业革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生产和生活的节奏加快,尤其在20世纪后期(信息化程度加快)。以此为据可以给人类历史绘制出一条上升曲线,其中有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后者发生在1760—1840年这个阶段)两个节点。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条件有:一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发

展,二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引用。在工业文明时代,自然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经济增长速度前所未有。

工业文明时代世界各个方面的变化都是巨大的。其时代特征有三,一是流动性。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来自西方的商品、人员、资金流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国家,而二战结束到21世纪初则呈现相反流向。越往后,技术和信息传播越快,生产要素趋向自由流动,世界各地人员联系和交流越是畅达。二是扩张性。跨国公司扩张导致资本全球化发展,使得全球贸易和财富规模增加。三是不平衡性。超大规模流动使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不稳定,带来相应的危机。<sup>[16]</sup>这也是耳熟能详的“全球化”现象。<sup>[17]</sup>对工业文明时代的认识和相关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有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全球化理论等等。<sup>[18]</sup>

人类离开农业社会的孤村炊烟,走进了工业社会的钢筋水泥之林。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有系统论述:人类的演化过程是由经济行为所决定。即使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也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的价值。现代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也对历史进程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深信不疑。以经济特征为依据,把人类历史分为农业(耕)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

### (三)以世界格局变动为依据

19世纪以来人类活动舞台扩大,个人和世界之间的距离拉近,“外国事务”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国际政治大事件比如美苏争霸、苏联解体、美国“9·11事件”、“阿拉伯之春”、利比亚危机等等,并非对普通人毫无意义。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超多强”的时代(1991—)。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强国且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保留着前一个时期的军事同盟、军事基地、海外驻军。世界范围内,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东盟等国家或地区总体实力增强,“多强”的地位上升。在此之前

“两大阵营对峙”的时代即“冷战时期”(1947—1991),美国和苏联两大国对抗,中小型国家不得不选择站在其中一个阵营以求生存。在“两极格局”中,军事上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意识形态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有自己的边界、结构、成员群体,有相应的规则和一致性。现代史对1991年前的历史是这样描述的:基于雅尔塔体系、经济全球化和核威慑等因素,世界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科技迅猛发展,社会财富不断积累,殖民体系彻底瓦解,但存在美苏冷战、中东地区动乱未息等问题。

再往前追溯是一个“大灾难、大变动”的时代(1914—1945)。这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四个旧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解体、苏俄政权建立、巴黎和会召开、国际联盟和委任统治出现、纳粹势力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德黑兰会议/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召开、联合国建立等。若以国际政治格局变动来区分,主要是三个体系的更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让位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让位于雅尔塔体系。

在这个时代之前是霍布森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1875—1914)。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之为“帝国的年代”。它形成于“资本的年代”(1848—1875)的经济基础之上,肇始于更远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帝国主义阶段”的直接冲突限于欧洲范围,而落后的亚非拉地区所受的影响主要是殖民主义之害。英、法、德、美、俄、意等国在世界范围进行竞争而加强军备,连最强大的国家也缺乏绝对安全。它们解决安全问题的办法是寻找盟友,通过结盟来增强自己的优势,体现在从三皇同盟、三国同盟到同盟国集团和协约国集团的缔约。其后果是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sup>[19]</sup>

以世界格局变动为依据来划分的时代,一般只是大时代中的小阶段。因为世界格局变动总有间歇性,而且偶然因素较多。持续的大规模战争后总有霸权国家出现,格局变动的过渡时期会



出现或长或短的和平。如两极格局解体后的世界有新的矛盾和冲突,却也没有哪个霸权国家能有效地“领导”世界。

综合起来看,以文化特征为依据定位“时代”,往往着眼于19世纪之前的人类历史,主要是书斋内的学问。以经济特征为依据定位“时代”,和当代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几千年的农业(耕)文明时代早已远去,而工业文明时代在行进中,我们还在这趟时代列车上。以世界格局变动为依据定位“时代”,仅从19世纪中叶至现在,格局已变动了四五次,似乎“时代”变换频繁,实际上我们还处于工业文明时代,还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还身处全球化的过程中。

## 二、“时代”定位的观念基础与思想支点

对一个个“划时代”的重大时刻进行思考、判断和预测,加以评论甚至赋予特殊名称,这是人类觉醒和思想深化的标志。此前人类漫长的演进“细节”往往由文学家和艺术家通过各自发挥想象来呈现。各国的编年或纪事的史书,往往以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的活动为主线。认识世界历史,定位“时代”,其实表明了现代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19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家没有明确的人类进步的观念,对历史的延续、历史的变化认识是含糊笼统的。自19世纪起历史学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进步观念形成,开始重视普通人的生活,开展史料批评,即斯宾格勒说的“这个世纪把我们带到了一座高峰上,我们从此处(在此时)可以看到脚下的新世界”。<sup>[20]</sup>现代人回顾和概括走过的历史有比以前更大的把握,至少在努力认识自己的处境,知道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将来要朝什么方向走。我们即使不完全认可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至少愿意从现实兴趣出发探究历史,以史料“复活”前辈甚至更远的祖先所生活的时代。

时代观念的基础首先是历史学的客观主义学派产生。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世界上

真正发生过什么,并不诉诸于任何理论模式,以免出现为了适应某个理论框架而削足适履地“加工”客观事实的现象。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革命”是兰克学派的出现,或称“科学史学”的开端,体现为两点:一是史料挖掘和科学鉴别;二是民族史的构建。该学派代表人物兰克认为推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是这个民族的天才的职责所在。到1871年,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都赞同“历史是他们共同的宗教”。<sup>[21]</sup>德国历史学家参与了德意志民族构建。而英国历史学家也发挥作用,他们相信,在英国发展到当时的地位(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又是进步的。法国历史学家也开始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有的学者把七月革命作为法国历史的转折点,认为“新建立的国家从拥有像基佐、梯也尔这样的历史学家中获益颇多,他们运用对中世纪法国的记忆和英格兰革命的教训,来为王朝建构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的合法性”。<sup>[22]</sup>美国历史学家从班克罗夫特(Bancroft)、海伯特·亚当士(Herbert Adams),到特纳(Turner)、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均致力于构建美国发展的历史。

历史学得益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帮助。在19世纪后期,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逐渐成为单独的学科。三个学科涉及的领域,分别研究市场、研究市民社会、研究国家。借助于社会科学的成果,既丰富了历史研究内容和细节,也深化了对社会结构、经济生活和政治制度演进规律的认识。历史学以往在探究因果和描述过程,吸纳社会科学的成果之后得以发挥有效阐释和解析的功能。

社会科学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发展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出现的,目标是认识和纠正那个时代的社会弊病,迫切要求社会改革。社会科学发展的标志是出现专业学术组织,“每个专业有一套话语、一个组织、一本杂志和一个学会”。<sup>[23]</sup>社会科学影响较大的组织在英国、美国和德国出

现。经济学最初称为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后来才称为经济学,从1881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成书,到1885年美国经济学会创立有一个过程。<sup>[24]</sup>社会学更晚一些,其机构的建立、期刊的创办和课程设计主要集中在19世纪最后10年。<sup>[25]</sup>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也是19世纪晚期的事,主要标志是三个重要研究机构(巴黎政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伦敦经济学院)的成立。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和20世纪上半期,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正式在大学作为学科确立。尽管95%的学术机构都在英、美、法、德、意五国,<sup>[26]</sup>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科也在西方产生了,一是人类学,二是东方学。人类学研究相对较小的群体,而东方学研究的族群从人口和居住区面积看是很大的,比如埃及学、印度学、中国学等。

无论如何,从此时起人类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认识角度发生了变化,认识高度和深度也都和以前不同。长期被忽视的习俗、制度、语言、观念也被思想家纳入认识和考察的范围。比如,黑格尔提示我们认识绝对精神世界的存在和人类历史的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引导人们注意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和基础作用,以及阶级差别引起的政治力量变动;斯宾塞试图用自然进化论来研究社会形态和组织结构变化等问题。按照新史学代表人物鲁滨孙的观点,由于科学的发现,19世纪这一百年已经证明人类知识可以无穷地增加,人类的状况可以无穷地改良。<sup>[27]</sup>这种进步史观,孔多塞在其著作中阐释得更为详细。

社会进化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可能与社会科学家的思想和主张关系不大。很少有哪一个领域的发展是先发现了原理、创造了理论,然后运用于实践从而产生良好结果;相反,原理的发现和理论的形成是在社会实践之上的总结和概括;不过,原理发现和思想形成毫无疑问会影响后来的社会实践。思想和学说最初产生的时候都是“果”而非“因”,但产生以后又变成“因”了。划分和定位“时代”,是高一层面的认知活动。无

数的实践活动都属于“低头拉车”,到了一定程度(比如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才能“抬头看路”,回首走过的路,预判未知的路。

谈论历史的进步,首先要知道人类走向何方。“如果人类历史并不是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前行,似乎可以说,有多少民族或文明就有多少个目标”,<sup>[28]</sup>那就是一个复杂的情况了。说到“人类走向”必然涉及终结,黑格尔认为历史终结于自由国家,马克思认为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社会,福山认为历史终结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学界的赞同、争议和批判都很多,无需赘述。整体来看,19世纪的人们对未来更乐观,20世纪的人们对未来更悲观。因为前者既相信现代科学能战胜疾病和贫困,也相信世界上多数国家会实行自由民主制度;后者经历了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苏联极权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危害,其乐观信念被摧毁。<sup>[29]</sup>经历20世纪中叶的高科技发展后,人类面临新的风险和危机,随后的70年代出现针对“人类困境”的研究,一批西方学者探讨了“人口、资源和财富增长的极限”“国际秩序如何重建”“人类的目标和前景是什么”等问题,<sup>[30]</sup>促使人类冷静思考并采取措施,避免发生世界性危机。

总之,定位“时代”显然基于一定的思想,而思想基础包括社会科学综合作用,思想支点在于社会进化和历史进步的观念。对于社会演进的复杂现象,即使预测社会发展的走向,也只能限于我们所说的模式预测或原理预测。<sup>[31]</sup>经济和文化现象或世界格局的变动作为定位时代的标尺或刻度,也不是仅有事实判断。对一个时代的定位和价值判断要经得起质疑。成熟的思想一定有观念的根据,因为社会的重要变迁往往与观念的变迁相伴随。“时代”定位的意义可从两方面反映出来。

其一,定位“时代”是人类为自己确定方向和位置。人对所处的时代很少满意过,于是出现两种观念,一是“今不如昔”。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言,“人们有时候会逐渐讨厌起他们生活的

时代,不加分辨地热爱和仰慕一段往昔的岁月”,“而且,下一步他们就会想办法往自己生活里引入来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过去的某些习惯和做法,并批评今不如昔,和过去相比退步了”。<sup>[32]</sup>另一种观念是面向未来。大多数宗教家主张面向未来,包括来世、天堂等等。现实中,王朝体系和相应的天下主义已成为历史陈迹;伊斯兰世界归化异教的理想深陷于资本和竞争的时代;欧美所标榜的外溢性自由主义未来,在全世界推广带来逆反和抵制;主张民生至上和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其实践活动尚在布满荆棘的路上。

其二,定位“时代”是为人类明确自己的使命。不同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与历史有联系,对未来有影响,在当时有价值,然而,这样的价值和意义不可能百世不变。这一时代的人认为是头等大事,另一时代的人可能觉得无足轻重;在这个时代认为值得赞美的,在另一个时代也许觉得遗憾。实际上“每一个时代所认识的过去,都是那一时代的需要、希望、信仰、成见、环境、情绪等所烘托而出的”。<sup>[33]</sup>因此每代人要明确个人在当代的处境以及必须承载的使命。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贝切伊(Aurelio Peccei)提出了“人类处境”以及面临的使命,<sup>[34]</sup>通过几十年的实践,仍有一些使命未能完全实现。以前承担的使命又一次摆在21世纪的人类面前。这样又回到老生常谈:每个时代的人有每个时代的使命。

### 三、一个时代的观念塑造和历史叙事

19世纪之后的学者们试图把全人类各个时代的“经历”尽数纳入考察和解释的范围,世界通史、人类文明史、全球史就显示了这样的雄心和努力。如果可行,历史就由多条支线汇成一条总线,而且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阶段进化的过程。其中,史料最丰富、线索最清晰可见、占据篇幅最大的历史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西方语言中没有“近代”一词,但加上时间限制如“1500—1914”足以表明世界近代史,“1750—1914”可以表明工业革命以来的近代史。把近代史置于重

要地位等于是把欧洲史放在世界历史的中心。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就是对这种状况的怀疑和不满。问题在于,近代以来欧洲人的活动遍及世界,欧洲人提出的理论和思想也占据了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科学阵地。亚非拉地区无反抗之力地被剥夺权利、被主宰命运、被拖入世界经济体系,在此前提下形成以抗争和革命为主题的近代叙事。因此,这两种不同的近代历史叙事并存,叙事主题不同,基调也不一样,背后的历史观念不同,但时代背景和认可的一套逻辑却相似。

(一)以“先进—落后”“中心—边缘”观念为基调

这一基调常见于世界近代史书写,集中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世界近代史书写的主题是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经济向全球扩张。其中,自由大宪章、议会制度、尼德兰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等,是一条线索;新航路开辟、海外贸易、世界市场、工业化是另一条并行的线索。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亚非拉落后地区反帝反殖民的过程(也是世界近代史的第三条线索)。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分工中处于有利地位,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客观上处于不利地位。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生态系统的高级生产者,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阶段。<sup>[35]</sup>“世界体系理论”形成于20世纪中后期,沃勒斯坦长篇幅论证了世界经济体系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中心—边缘”关系的论断。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有强大的中心国家,也有边缘地区与外部竞争场所。<sup>[36]</sup>

(二)“现代化目标”的共识和追求

从农业(耕)文明时代向工业文明时代转变的过程,被称为现代化进程。主要标志是传统经济(农牧业为主)向现代经济(工业占主导)转型,亦即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这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sup>[37]</sup>因此,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和西方化。工业化指经济结构中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在重要性方面取代了农业。



工业化造就了西方的优势。世界各国寻求的发展目标是现代化,问题在于,不管哪个国家,要向现代化就不得不以西欧北美为榜样,走西方化道路。在这一点上似乎近代各国形成“共识”,学习和仿效的目标大体一致。这也形成了世界近代史的叙事思路:西方道路也许是一个偶然,但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明社会,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源头在西欧,西欧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引领者;18世纪肇始于英国的工业化是初期工业化,19世纪中叶是成熟的工业化或高度工业化(西欧北美的工业化),20世纪世界其他地区才开始工业化。

### (三) 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近代叙事

1. 欧洲话语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民族国家的兴起早于“工业文明时代”。先是西欧单个民族国家兴起,后来逐步形成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到20世纪整个世界格局已是“民族国家之林”。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民族国家形成的基本路径是摆脱欧洲封建制度,统一民族市场,强调本国利益至上,新教取得主导地位。不过,民族国家的发展导致欧洲的分裂。16—17世纪欧洲国家之间面临着如何规范相互关系的问题,学者们著书立说,创立国际法。从格老秀斯(Hugo Grotius)的《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论述,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实践,“国家主权说”实际上否定了“世界主权”,确认了领土主权、国家独立等观念。欧洲国家之间开始常设使馆,处理外交事务。起初的“万国公法”(Law of Nations)发展为“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欧洲人把这样一套处理欧洲内部事务的准则推广到全世界,并且在处理一战后的世界事务时付诸实践。

2.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叙事。民族主义思潮传播到亚非拉地区后,促成这些地区人民反对外国侵略,支持本国民族解放,追求“民族奋斗目标”的运动。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迫切需要完成民族独立和社会转型双重任务,例如中国、土耳其、伊朗、埃及等国的自强运动、经

济改革、制度更新和新文化运动等。<sup>[38]</sup>中国康有为的宪政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土耳其凯末尔主义,印度甘地思想,印尼苏加诺主义,萨提·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等,都意在寻求本民族的发展道路。以中国为例,1840—1919年被看作一个追求民族解放的早期阶段(1919—1949年是新阶段),其叙事基调是“革命叙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和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情叙事”。1978年之后增添了“现代化叙事”(近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洋务运动为中国学习西方、适应世界潮流、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摆脱半殖民地命运)看作并行发展的主线。<sup>[39]</sup>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后,土耳其选择了完全西化的道路,共和国建立后重新建构土耳其民族史观,建构土耳其近代历史(结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就是摆脱衰弱、腐朽和落后)。日本未经抵抗就屈服于西方,迅速学习美国、英国和普鲁士的先进技术和制度。在其他东方国家看来日本走了捷径,于是学习日本,但速度慢也不成功,一部分国家转而学习并仿效苏俄道路。事实上,每个落后国家都想走一条成功现代化而又不丧失本国传统的快捷之路,这是世界近代史上非西方的民族国家史叙事。

### (四) 观念和叙事中的格式化

在前述观念和叙事中,可以看到一些格式化的对称概念。例如,事实判断中的“先进”对应的是“落后”。不仅仅清王朝晚期和欧洲人打交道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国旗、国徽等等标识“国家”的东西,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幕府时期的日本也是一样。因为都停留于前民族国家时期,只有时间上的朝代,没有“国家”的清晰概念。又如,现代化过程中学习和仿效西欧国家时表现出的“主动”与“被动”。资本主义经济席卷世界各个角落,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本来就落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直辖殖民地者居多,而中国清王朝、奥斯曼帝国、波斯恺加王朝



等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一般都是被迫承认西方先进,被动学习西方文明。与此相关的对称概念还有“冲击与回应”或“挑战与应战”“优势与劣势”等等。工业文明冲击和东方社会应对挑战,是借用了汤因比讨论文明盛衰的概念。而“西方优势论”在不同时期内涵不一样:从近代到20世纪30年代偏重于“种族优势”,冷战时期偏重于“制度优势”,从20世纪90年代起似乎偏重于“文明优势”。世界上的国家按照经济发展程度,也划分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于是,在这个倾斜的世界舞台上,各个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国家”位置,对号入座。

#### 四、结 语

“时代”变换或更替即许倬云所说的“时代转移”,也不是新鲜的论题。一切都是进行时态。一般而言,观念往往赶不上时代变换的步伐,历史叙事也要随之书写续篇,而另一方面,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影响层面广泛,此前支配社会的教条或固化的观念到了后一个时代也会不知不觉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观念和叙事在现当代延伸并不奇怪。问题在于,要分清清楚其中的“变”与“不变”,了解事实判断的准确性和价值判断的合理性。细究起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判断,而清末李鸿章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则是对当时本国面临困境的判断。这一“变局”之说出自1872年的奏折中,<sup>[40]</sup>其内容是奏请朝廷加强海防。

西方的全面优势和示范作用潜移默化成为一种心理暗示,似乎不仿效欧美就难以发展也无法进步。西方优势的逻辑和东方寻求解放和走向现代化的逻辑不同,却认可同一种客观趋势。或者说,东方国家以西方为参照看到了自己的劣势,西方国家以东方为参照强化了自己的优势。总体来看,时代出现转折未必是良好时机的到来,相反可能要面对非常的境遇。现当代历史叙事延伸近代叙事,表明没有实质性跃升或突破性

的进展。时代转折一般由“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促成,如果后一个时代出现与前一个时代明显不同的特征,开始一种新的叙事,那才表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 注释:

[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初是2017年12月国家领导人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后来在不同的政策文本和学者的文章中被引用,逐渐变成对当下时局的一个判断。学界有不少人对此进行专门阐释和论证,或者在文章中作为限定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来展开自己的论题,已发表的文章有数百篇之多。例如,王少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涵与哲理》,《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4期;于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历史进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徐蓝:《500年世界历史变迁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等等。2020年之前的研究和讨论,已有学者作了汇总和述评(董振瑞:《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这两年又有新的文章涌现。

[2]表示“时代”的英文有 era, epoch, age, times; 法文有 Le temps; 德文有 Zeit, Zeiten; 俄文有 эпоха, время; 日文有じだい(時代); 土耳其文有 Çağ, devir, zaman; 希腊语有 φορέας。

[3][12] Oswald Spengler,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1, Translated by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Random Shack Publisher, 2016,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December, 1917), p. 16.

[4][9][33] 雷海宗:《历史·时势·人心——隐藏的大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64-68、173页。

[5][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55页。

[6] Robert A. Nisbet,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Aspects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20 - 121.

[7] J. G. Herder,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Leipzig: J. F. Hartknoch, second ed., 1821.

[8] Pascal, *Les Pensées: Sur La Religion Et Sur Quelques Autres Sujets*, Monaco: Editions du Rocher, 1961; Bossuet, *Discourse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Paris: F. Didot, 1852; Jean Bodin, *Louis Le Roy, De La Vicissitude ou Variete des Choses en l'univers*, from: 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pp. 37 - 47.

[10] 通行的以耶稣诞生为分界线的公元纪年法,可追溯到17世纪塞维利亚的史家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

[11] Turgot, *Tableau Philosophique des Progrès Successifs de L'esprit Humain*, Paris, 1808 (nouvelle édition, Calmann - Lévy, 1970); Appelt, *Die Epochen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Verlag Hochhausen, 1845; Theodor Haering, *Die Struktur der Weltgeschichte*, Nabu Press, 2013; Flée/Freie, *Das Geschichtliche Selbstbewusst-*

sein des 20. Jahrhunderts, Publisher H. Keller, 1937.

[13]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 德国哲学家, 主要著作有《存在主义论文集》《预期与展望》《历史起源与目标》等, 在《历史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之说。

[14]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面对“共时性”和“历时性”的问题时有自己的阐释和处理办法, 提出多元文明平行共处的形态学。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黑格尔历史观(一种基督教历史观)和西方文明叙事。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 历史哲学其实只在西方兴起, 历史哲学垄断了历史意识, 而西方文明占据了历史哲学。

[15][31][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冯克利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第40、25页。

[16] 例如, 传染病的流行、种族矛盾、贸易摩擦、政府力量被削弱、恶性竞争导致地区局势紧张甚至冲突。诸多变动源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变动。

[17] 世界历史领域“全球化”所考察的起点是新航路开辟、价格革命和工业革命, 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考察的起点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世界货币, 全球市场最终形成,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等。

[18] 其中有贡献的学者如: 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罗斯托等; 新帝国主义代表人物巴兰;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等; 依附论代表性人物弗兰克和卡多索; 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 不平等交换理论代表人物阿吉里·艾曼纽尔、阿明, 等等。详见 Jorge Larraí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Capitalism, Colonialism and Dependency*, UK, London: Polity press, 1998, p. 4.

[19] 从拿破仑战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一个世纪(1815—1914)也被称为“蒸汽的时代”“民族主义的时代”和“资产阶级的时代”, 其实是以经济特征来判断的, 而不是按照政治格局变动。

[20] Oswald Spengler,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2, Translated by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Random Shack Publisher, 2016, p. 38.

[21] Geor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Rev. ed., Middleto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1.

[22][26][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 1789—1914》, 吴英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 第289—290、310页。

[23] John Maloney, Marshall, *Orthodoxy and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 当时各国成立的学术组织名称和时间分别是: 英国的国家社会科学促进会(1856)、美国的社会科学协会(1865)、德国的社会政策协会(1890)。

[24] 1881年马歇尔写成《经济学原理》教科书, 1890年创立英国经济学协会。美国的理查德·埃利(Richard T. Ely)于1881年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1885年他和其他人共同创建了美国经济学会(AEA)。

[25] 美国的社会学得到正式承认是1889年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Small)用一门社会学课程取代道德哲学课程, 1892

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建社会学系, 1895年创办《美国社会学杂志》。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98年创办《社会学年鉴》, 1902年在巴黎索邦大学成为“教育社会学”专业的教授。

[27][美] 鲁滨孙:《新史学》, 何炳松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37页。

[28][29]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pp. 7, 4.

[30][美] 德内拉·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 李涛等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 [美] 梅萨罗维克等:《人类处于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 梅艳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年; Jan Tinbergen, *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E. P. Dutton, New York and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6; Ervin Laszlo, *Goals for Mankind*, New York: E. P. Dutton, New York and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8; Bohdan Hawrylyshyn, *Roads Maps to the Future*,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32][英] 以赛亚·伯林:《现实感: 观念及其历史研究》, 潘荣荣、林茂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年, 第1页。

[34] 人类困境是文明的危机、文化的危机, 表现为人口激增、环境破坏、经济危机、社会不公平、广泛存在的贫困和失业、东西方的对抗、军备竞赛、陈旧的制度不适应现实需要等。人类使命包括: 寻找和遵守地球上有限的生物物理资源有关的“外部极限”; 寻找和遵守决定于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适应外部世界极限的“内部极限”; 维护和发展文化遗产; 建立“世界共同体”的意识; 制定世界生态计划以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建立保证世界共同体所有经济结构有效地发挥职能的世界经济体制。详见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第337—348页。

[35] 何传启:《东方复兴: 现代化的三条道路》,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年, 第31页。

[36][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 郭方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 第360页。

[37]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年, 第17页。

[38] 包括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时期的(1839—1876)西化改革, 清政府设总理衙门(1861)和开展洋务运动, 日本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1868), 印度反英起义(1857—1859), 清王朝戊戌变法(1898)和预备立宪(1906), 土耳其宪政革命(1908), 中华民国建立(1912), 伊朗巴列维王朝建立和礼萨·汗改革(1925), 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运动(20世纪20—30年代)等。

[39] 马勇:《老辈史家对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调整》, 《兰州学刊》2016年第3期。

[40] 在1872年的《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 其原话是“……我皇上如天之度, 概与立约通商, 以牢笼之,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 胥聚中国, 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责任编辑: 刘毅]